

关于良渚遗址群衰落的一些思考

□ 乔文杰

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良渚遗址群则是良渚文化最为辉煌的遗址。自良渚文化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科学发掘,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村落、墓葬、土筑高台大墓葬群、祭坛和大墓复合遗迹及遗址分布情况。积累了丰富的考古材料,也获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近来的研究也逐渐趋向从遗址的整体宏观入手。近年来随着良渚遗址群众多考古资料的正式出版,为人们今天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远比过去简报丰富的信息和全新的基础。本文拟就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版的资料,就良渚遗址群的衰落谈谈自己的意见。

浙江良渚遗址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部,地跨瓶窑、良渚两镇,遗址群面积近50平方公里,以良渚文化古城为中心,在其周边分布范围内分布有13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这130多处遗址中,有25处已经经过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有30多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试掘,其他遗址也进行了一定的钻探。包括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批重要遗址的发现,反映了良渚文化高度的文明成就,也说明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遗址。作为良渚文化分布区最具规模和档次的遗址聚落群,它代表了良渚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代表了良渚文化最先进的主流文化,对它的考察,具有特殊的含义^[1]。

在对良渚遗址群的考察研究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在吴家埠和庙前遗址较为丰富,但就整个遗址群来说仍很贫乏,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良渚中期的遗址数量在整个遗址群中是最多的,而且类型丰富,规格很高,有礼制性建筑、

贵族墓地、祭坛、居址等,已形成相当规模的中心聚落,所以,良渚中期是良渚文化的繁荣时期。晚期的遗存多数年代偏早,最晚期的遗存甚至含马桥文化因素的过渡性遗物也有所发现。这就说明良渚文化在这一区域有始有终,并没有突然消失^[2]。可以说良渚遗址群的发展比较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有一个开始起步,发展至高潮,再式微的过程。但有所不同的是,良渚遗址群的辉煌似乎在中期之后就转瞬即逝了,衰落得非常快。因此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

过去研究良渚衰落得出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灾害说^[3](有水患说,包括洪水和海侵,也有瘟疫说)、征战说^[4]、内因说^[5]。

前两种观点由于提出较早,可以证明的材料过于单一,在今天看来其意义更多的在于整个研究的开拓性。而内因说从良渚文化的内部入手,提出宗教作为良渚贵族统治的手段,既是良渚文化顶峰时期出现的动力,也是整个社会模式逐渐失去自我调节能力最终导致社会模式崩溃的原因。良渚社会将大量的劳动力加入到玉器和工程建设的群体当中,使实际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却没有相应的增加(甚至可能减少),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又并不能迅速提高农业的产量。巨大的工程、数量惊人的玉器加重了其本身的负担,这些非生产性支出破坏了内部平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设想,生存资源(主要是粮食)的产出和需求就很难长期保持平衡,最终导致社会崩溃,文明消亡。

在这里能否做出上述论断,首先应该考虑良渚人群自身的实力,究竟它具有多大的能量,能否负担那些非生产性支出。毕竟良渚遗址区内发现的大型工程到现在也只有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以及刚刚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可以肯定这些规模庞大的建筑并不是同时开始兴建的。如果良渚人拥有的

人力资源足够庞大,在良渚中期百余年的辉煌期里,兴建这些建筑恐怕并非难事。只要组织准备充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恐怕就不会像过去人们估计的那样了。

良渚庞大的遗址群说明其拥有的实力远远超出了当时周边良渚文化区内的其他聚落,也可能超出今天人们对它的估计。在已知的 100 多处遗址中,莫角山的规模最大,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属于一级中心遗址。1~6 万平方米的遗址有 40 多处,其中一些属于二级遗址。多数遗址的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下。某些遗址联成一片,如马金口、龙里、小马山、石安阪遗址紧密围绕在莫角山,总面积达到 15 万平方米^[6]。刚刚荣获 2008 年十大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面积约 30 余万平方米,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充分说明良渚遗址群已经形成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集团。

如此庞大的面积,其人口规模也应该很大。具体数字虽然很难搞清楚,但可以通过人口考古学的方法推算出大体的人口规模。史前人口的研究方法,目前采取推测的方式来进行,以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进行推理已经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西方学者考察现代一些原始部落的聚落规模与人口数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类比分析,得出史前聚落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是 1 万平方米约 150 人,这个统计约数可以在 100~200 人之间^[7]。陶寺遗址的面积为 600 万平方米^[8],周边有 60 多处遗址,其中 50 万平方米以上的有 4 处,10 万平方米左右的有 20 处,5 万平方米左右的大约有 30 处。参照上述方法推断,其早期即遗址繁荣时期人口在 4~5 万之间^[9]。良渚遗址群的人口规模参照陶寺的情况应该不少于这个数字,甚至可能更多。此外良渚集团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及影响力还可以获得周边聚落人力、物力的支持,周边的聚落也有这个能力。

对于玉器过多的投入这一说法,笔者也有不同看法。玉器生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当时玉矿资源稀缺,到目前为止考古调查所见到的玉矿产地只有江苏小梅岭一处^[10],所以原料的供应量不会很大;其次由于较高的技术要求导致玉器工匠的数量不会很庞大。通过上述推理,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在玉器生产上,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是无效的;二可以得出其产量不会很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反山、瑶山、寺敦、福泉山等

遗址分别一次性出土数量庞大的玉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认为当时的良渚社会弥漫着一种奢侈的社会风气。事实上,这些数量庞大的玉器不可能短期生产出来,也是经过一代一代长时间逐渐积累,然后伴随着良渚贵族的死亡再一代一代随葬到像反山、瑶山、寺敦、福泉山等贵族墓葬之中。看似数量庞大,其实对社会生产的影响不会太大。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按照内因说的观点推理,良渚遗址群内部由于以最大人力、物力对宗教行为的直接投入导致现有社会模式的崩溃,那么良渚遗址群现有的考古发现能否验证这一推理,或者换句话说,按照这一推理接下来应该发生的变故与发现的遗存能否符合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失衡导致社会崩溃,那么社会动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目前良渚遗址群中,反山、瑶山发现的大型贵族墓地除因后世盗扰之外,绝大多数墓葬保存完好,并且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高级随葬品。这些大墓建造在非常显眼的高大的土坛之上,如果社会发生动乱,它们很难幸免于难。现有的考古资料只能看出在中期之后,上述贵族墓地停止了使用,并没有大的社会动乱的痕迹。

二

那么良渚遗址群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最终导致衰落的呢?

从文化内部寻找原因,仍然是本文探索良渚遗址群衰落的起点。因为在对古代遗址和文化的变化进行解释中,单一原因模式正逐渐被多原因、多变量的系统模式所取代,遗址中的人口数量、密度、增长率,人口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及人口与资源、技术、环境和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有可能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之中成为影响文明衰落的因素。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只要是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中,其生存、发展必定受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又有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环境。早期对环境的依赖比较大,越到晚期对环境的依赖越小,而对其改造越大^[11]。

良渚遗址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属于山前河谷地带,西、北丘陵相夹,中间水网密布。现今的东苕溪从西南向东北流经遗址群。在距今 6000 年前,杭州湾的轮廓逐渐形成,陆地范围不断扩大,生存环境渐趋

宜人,良渚先民的活动和居住范围日益扩大,良渚遗址群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繁荣起来的。

在从早期向中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区内的遗址不断增多,到中期时基本上已经布满整个地区,遗址群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出现:第一就是个别单个遗址的面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遗址群西南部以莫角山为中心,分布着50多处遗址,密度非常大,类型也最为丰富;遗址群东南部以良渚镇荀山为中心,在一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发现有20多处遗址,分布密集,几乎连成一片。第二就是不同的聚落开始出现功能上的区分。姚家墩及其周边的遗址形成的聚落可能是某一显贵阶层的聚居区。姚家墩是遗址群内除莫角山外单体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址,位于聚落中心,呈南北向长条形,面积6万平方米。遗址内建筑遗存较多,并经多次兴废,是一处长时期沿用的居住区。姚家墩周围分布着数个不同功能的遗址,其中,西北的卢村有祭坛和小型墓葬,东部的王家庄、料柄勺有建筑遗存和贵族墓葬,西部的金村有生活堆积。与姚家墩聚落不同的是,庙前是一处成片相连的大型聚落。发掘材料显示,庙前的生活区在中部和北部,内有河沟穿过。房址、灰坑、水井、窖穴等分布其间,墓葬则分布于遗址的西部和北端^[12]。结合庙前遗址多年的发掘材料可以推断主要是平民居住区。

这几处大型聚落再加上周边的其他遗址组成了良渚遗址群这样一个超大型聚落,如同一个黑洞在凝聚内部的同时一圈一圈地扩大,同时还吸引整个太湖周边良渚文化区,形成一个考古文化上较为统一的局面。玉琮、玉璧、玉钺等一批玉器,广泛流传于良渚文化区内,展现了良渚作为地区中心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它显示出强大力量的同时,它也像另一种黑洞大量消耗区内以及周边的自然资源。良渚地区先民不断的森林砍伐(遗址中发现的木漆器、建筑木构件、柱洞等说明需要大量木材),造成山麓地带水土流失。人口不断增长就要求更多的耕地。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地层中早期的稻作花粉有一定的含量,晚期则有较大的发展,达到总数的5%以上,金山亭林的良渚文化地层中,含禾本科植物也较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稻作花粉,类似的遗址还有马桥和果园村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地层中,其稻作的花粉也相当丰富^[13]。在

广富林遗址的良渚文化早期,其木本植物数量和种类都减少,草本植物数量比前期减少,但栽培的禾本科植物还较丰富,说明先民们耕作的面积有增无减^[14]。聚落的不断增多扩大占有了周边的耕地,迫使人们把开垦的目光扩大到附近的浅山丘陵。这样周边山区的林木除了生产生活需要外,还要遭到毁林开荒的破坏。

粗放型的农业活动以及周围林木的长期砍伐对遗址区内的自然景观、生态系统无疑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从航拍图片观察,反山一带在东苕溪改道前曾被北面多条山谷的洪水冲击。推测这一时期东苕溪已有多次改道迹象。改道初期的东苕溪常常泛滥,例如,姚家墩遗址南面的东苕溪水就有明显溢出南冲至稚山一带的痕迹。当然面对洪水威胁,良渚人依靠自身积累的经验也积极做出应对。在良渚遗址群里,塘山是一条东西向的土垣,长达4.3公里,依托自然低丘,人工连接营筑而成。该遗址位于遗址群西北部,外侧与天目山余脉的南麓坡底并行相聚约200米,其间不见文化遗迹。西端向南转折,一直延伸约700米。显然,当时人有意识地利用这段土岗,造就了距尺形的一条长堤。其外侧至今有多段长条形池塘,表明防洪是其主要功能,它是阻挡来自西部山地和北部山谷洪水的有力屏障^[15]。在当时那段漫长的人水较量的历史中,应该是互有胜负。但是资源的耗竭加上日渐严峻的生态形势却是人力难以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迁往他乡就成为这一带先民唯一的选择。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依赖采集渔猎为生,终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到原始社会晚期和奴隶社会,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当时技术水平低下,耕作十分粗放,地力一旦耗竭,即需另辟新地,这种迁移农业方式决定了人们居住地的经常迁移。如中国夏朝延续400年,迁都10余次,商朝持续600年,迁都16次。直到奴隶社会末期,定耕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人们随之在一个地方永久性地居住下来,人口迁移才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次要现象。

三

上述推测虽然还不能找到直接的考古材料证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良渚文化其他分区的变化作为旁证。太湖东部的福泉山遗址^[16]曾发现多座

(下转22页)

考古》1985年第1期;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襄樊市考古队《湖北襄樊蔡坡战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2005年第11期。

[7]杨权喜《襄阳山湾出土的郢都和邓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8]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9]襄樊市考古队2004年~2006年发掘资料。

[10]襄樊市考古队2004年~2005年发掘资料。

[11]襄樊市考古队《襄樊市彭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市彭岗东周墓群第三次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襄樊市文物管理处等《襄樊彭岗东周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12]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发掘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襄樊市文物管理处)

(上接12页)

大型贵族墓葬,被认为是本地区的一级聚落中心。遗址被研究者分为五期,其中第四期为良渚文化的鼎盛期,绝对年代为4500~4400年。这个时间几乎和良渚遗址群衰落紧密衔接。而墓葬资料中,也是从第四期开始出现普遍随葬玉钺、玉琮、玉璧及生前掌握军政大权和神权的贵族大墓。很有可能良渚贵族带领族群,在故乡难以继时迁移至此。此外良渚晚期与良渚遗址群临近的寺敦、草鞋山、福泉山同时出现大型贵族墓葬恐怕与良渚遗址群衰落之后,良渚贵族向外迁移有关。

过去,对良渚文化衰落的研究有一概而论的倾向。在整个良渚文化区中,各个小的分区都有不同的特点。它们从兴起到辉煌再到衰落并不是同步的。当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发展为整个良渚文化地缘中心时,太湖东部的福泉山、北部的寺敦等遗址还在处于成长期;而当良渚遗址群衰落之后,这些遗址成为自己所处区域内的中心遗址,这恐怕并非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巧合。各遗址的兴废时间有先有后,原因可能相近,也有各自的特殊情况,不能一概与良渚文化最后的衰落挂钩,当然这就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1]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12月。

[2][6][12][15]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3] a 刘方复《中国史前的洪水》,《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 b 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4] 如: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5] 主要参见 a 许倬云《良渚文化到哪去了?》,《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b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7] 郭凡《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全国大遗址保护资料——陶寺遗址》,2001年1月。

[9] 杨国勇主编《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 a 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b 王华田、袁旭音《江苏小梅岭硅灰石矿床特征及其成因》,《火山地质与矿产》1996年第2期。

[11] 贾学德、郑建明《人地关系简论——以环太湖史前的食物结构变化为例》,《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13] 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14] 张玉兰等《广富林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先人生活环境探析》,《同济大学学报》2002年第30卷第12期。

[1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1年。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